

选择与理解:20世纪初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的关系,从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证明,俄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沙皇专制难逃历史劫难、各种改革难挽衰败颓势、西欧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俄国难以奏效、平民知识分子对革命必然性的认知等社会现实“刺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俄国落地生根,与它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俄罗斯社会“水土”、它的唯物论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相契、它的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与其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改变现实之望的相合、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部分抱有俄国“特殊论”的知识分子心理的相符、它的世界历史视野与急于追赶现代化步伐的俄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相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两者间的“契合”,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关键词:俄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变革理论;唯物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4-0082-09

19世纪下半叶,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中心区域渐趋“沉寂”时,却在它的边缘地区——俄罗斯大地激起了巨大回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此时的俄罗斯大地生根开花,是俄国社会“主动亲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土适应”的互动结果。

一、选择: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而言,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社会现实“刺激”之果。

在世界文明的演进历史中,俄罗斯无疑属于“后来者”^①。当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不仅封建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

展^②,而且文化也有了极大繁荣^③时,东斯拉夫人只是从公元6世纪起,才有了沿着河流两岸建筑的村落,才出现了简单的商业和手工业并用铁制工具从事农业生产^[1]。直到公元9~11世纪,东斯拉夫人才有了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1],统一的宗教基督

① 大约在公元1世纪,斯拉夫人逐渐分为东、西两支。公元6、7世纪左右,又形成了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又称“安特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② 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凿井灌田、修建水利工程等;手工业生产中,采矿、冶铁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煮盐、纺织、漆器、陶器业也已出现,甚至出现了人造玻璃;商业开始兴盛,广泛使用货币,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通过商业相互交换;城市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③ 秦统一中国前,诸子百家争鸣,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天文立法、勾股定律的出现。到秦汉时期,则有了哲学如王充的唯物论、文学如乐府诗和汉赋、史学如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科学技术如天文学家张衡、数学家张苍、耿寿昌、医学家张仲景、华佗,以及发明了造纸术等等文化景观。

收稿日期:2016-07-11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课题

作者简介:郑忆石(1954-),女,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教^①,统一的文字基里尔字母^②,统一的法律《罗斯法典》^③,最早的世俗学校和教会学校^④,以及具有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最初编年史》^⑤。到公元15世纪,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才最终形成^⑥。到16世纪,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沙皇^⑦。

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俄罗斯同样是“落伍者”。当近代西方各国早已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⑧时,作为“东方西大门”的俄罗斯,只是到了19世纪才真正迈出了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发的脚步^⑨。尽管农奴制的废除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俄罗斯的工业革命,但是俄国的工业文明、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较之西欧和美国,仍然十分落后^{⑩[2]}。经济上的落后,政治、军事上的保守反动,以及对西欧国家的依赖,使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与封建残余紧密结合,在形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最终使得它成了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史上,俄罗斯仍然是“后进者”。自14世纪到18世纪近代西欧各国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各种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诸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大批科学巨匠,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批人文巨星,以及以英国经验论、法国唯物论、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大量思想巨人。正是这些巨匠、巨星、巨人们,在使以人道主义为标识的资本主义文化大放异彩的同时,也确立了以欧洲文化为发展方向的近代先进文化。然而,作为“西方东大门”的俄罗斯此时依然沉浸在封闭、保守的拜占庭文化中。拜占庭文化^⑪无疑具有二重性:就它包括的埃及、西亚的文明故地,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优秀文化遗产,以及对东方文化成果的一定传承,从而较之欧洲中世纪文化而言,它是先进的;就它信奉的基督教,其教义、教规都表现为强烈保守性的东正教,而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言,它又是落后的,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显东方色彩的封建文化。拜占庭文化之所以能为基辅罗斯接受,是其所包含的东方文化因素适应和符合了罗斯社会的东方化现实。及至19世纪,俄罗斯仍然坚守着拜占庭文化的圭臬。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提出“要以维护‘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作为教育纲领的基本内容”^[3]便是明证。而坚持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不仅表明了拜占庭帝国与天主教国家的区别,更表明了拜占庭文化的实质。因此,尽管俄罗斯文化于18世纪初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然而彼

得改革所追求的决非文化、观念等精神性目标,而是强国、现代化等现实性利益。因此,尽管彼得的改革真正引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社会发展道路的东西方之争、俄罗斯文化的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争,尽管在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俄罗斯开始沿着彼得改革所开辟的西方化道路前行了,但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假晶现象”^⑫,因为那“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的“原始沙皇制度”^[4],在使俄罗斯文化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东方专制主义束缚的同时,也使得带有沙皇专制制度沉重历史包袱的俄罗斯文化,具有重理想主义轻现实生活^⑬、重浪漫主义轻理性主义^⑭以及强烈

①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缔结联姻,加入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并宣布它是罗斯的国教。

② 约在862~863年,基里尔和美多德依据希腊字母创造的新斯拉夫字母。

③ 基辅罗斯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制定的体现封建主阶级意志的法律,包括《罗斯拉夫法典》《罗斯拉维奇法典》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法规》。

④ 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都非常重视教育。后者在基辅索菲亚教堂附近开设了古代罗斯第一座图书馆。

⑤ 基辅佩切尔斯基修道院修士涅斯托尔在补充、修订和汇集前人的历史记载基础上完成,于1073年编成《往年纪事》。

⑥ 1485年,莫斯科大公正式称谓“全罗斯”大公。

⑦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史称“沙皇”。

⑧ 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科学发明,它们引起知识、思维方式、社会的巨变,最终导致工业文明的兴盛,使西欧各国迈进了现代工业文明的门槛。

⑨ 1700年前后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是俄罗斯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则是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标志。此后,俄国资本主义才得以迅速发展。

⑩ 李宏图等指出:“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工业产量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平均增长了6倍”,“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1899年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5/6,20世纪初,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仅占41%。工业生产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平均落后于西欧北美。90年代初俄国棉纺织业中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1/2至2/3。钢、铁、煤等的人均占有量也都无法与西欧、北美诸国相提并论”。参见李宏图,沐涛,王春来,等:《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页。

⑪ 公元10世纪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接受的基督教即拜占庭文化。

⑫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当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时,从这种年轻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感情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致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假晶现象”。

⑬ 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瑟·兰波,在展望自己的未来生活时,将其称为“生活在别处”,即将理想生活置于世俗生活之外的某处。1973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该句作为其书名。

⑭ 19世纪俄罗斯让世界瞩目的是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包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列宾的绘画、托尔斯泰的文学,以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极具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这些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其特点如同米兰·昆德拉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所言:“情感被抬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理性精神的缺乏,不仅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充分,而且在其哲学中,也具有浓烈的“泛道德主义”气息。

的救世主义情怀^①等特点，而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和附属品的宿命。

与俄罗斯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应的还有俄罗斯人的社会心理，即在一个由农奴制主导的国家中阶层间存在着社会从上至下的“金字塔式”层层奴役：从贵族、僧侣、工商业者，到地主、农民，乃至村社和全体人民，无一不在奴役之网中生存，“整个生活秩序都由农奴制关系所构成：官员受上司的奴役，下级上司受上级上司的奴役，僧侣受奴役，商人受奴役。法庭、军队和学校都以农奴制关系为基础建立。所以人际关系都是农奴制从属关系，所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多深，地主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就有多深”^[5]。尽管俄国的农奴制产生，一定程度上与俄国民众缺乏个体自我意识、自愿奴化心理严重，只服从暴力的社会心理有关，而这又与俄国根深蒂固的村社文化传统相联，“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6]。直至 19 世纪中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农民，仍然生活在村社之中。而农奴制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自愿奴化”的心理，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诸如重集体意识轻个性自由，如对东正教强调的“共同性”信仰的认同、对国家的崇拜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国家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爱国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3]；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既驯服顺从，又狂热好斗、勇敢顽强等“好走极端”的特点^②。

因此，当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③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冲击，而难逃衰落、崩溃的历史劫难时；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先后通过农奴制改革和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法律、教育、财政、军事制度的改革，力图挽救颓势，但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平息，反而更为剧烈，农民的人身依附反而更为普遍时；当无论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④，还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⑤，都无法改变俄罗

斯落后的社会现实时；当进步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看到俄国经济的欧化伴随着俄国政治的欧化，从而在俄国平民知识界面前展开了广阔前景，使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并决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时；当平民知识分子意识到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决不可能靠沙皇的怜悯，也不可能靠政府的改革，更不是由少数知识分子的一腔激情、自我牺牲精神，甚至恐怖主义行动（如民粹派的后继者“民意党”）便可成功，而只能依靠唤起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并付诸行动，从历史观维度论证革命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于是，一时间“所有稍微先进的人们，都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7]。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俄国而言，它之所以最终落户于这片土地，则因其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了俄罗斯社会的“水土”。

这种革命理论对于俄罗斯现实的适应，第一，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如社会革命的根源，“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8]，革命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9]等等理论。诸

① 源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思想，经由斯拉夫主义到 19 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人得以传承。

② 对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等著作中，皆有论及。

③ 一方面，因其制度性腐朽，俄罗斯的经济自生能力极其脆弱；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沙皇专制、扩展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沙皇政府从 18 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起，就大举向欧洲国家借债。而西方国家也认识到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落后的沙俄，正是资本增值的沃土，为了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在极力维护沙皇专制的同时，从各方面给予它经济支持，对它大举放债。

④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俄国人主要是学习、宣传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如法国空想的批判社会主义。

⑤ 1848 年欧洲革命，在暴露出西欧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促使俄国社会主义者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重新认识俄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的价值时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温床，俄国的未来人是庄稼汉而非工人，俄国的未来社会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是从古老的农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秉承“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自 1867 年起，俄国民粹派开始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历程，史称“行动的民粹派”。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到人民（主要是农民）中去宣传和发动革命的强烈愿望，从 1873 年冬天起，“到民间去”成了知识分子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并迅速付诸行动。由此，俄国民粹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如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第二,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10]等等理论。诸如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9],“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11]。第三,要大胆喊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12]的革命战斗口号等等理论;诸如社会革命的作用在于“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13]。第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2]等等理论;诸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针对劳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9]。第五,关于社会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形式、类型等等理论。这些理论既处于资本全球化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世界历史中,又兼具帝国主义国家特点与广泛保存农奴制残余特点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其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格外尖锐复杂的俄国而言,提供了走出困境的理论武器。尽管上述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全部进入俄国。换言之,此时只有极其有限的载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书籍,被翻译到俄国。但这对于如同一堆干柴的俄国来说,已经足够了。对此,别尔嘉耶夫也承认: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每个人对生活的感悟”,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有一点空想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更符合1917年俄国的局势,更符合俄国固有的某些传统,更符合以暴力来管理和统治的俄国式方式以及更符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极端俄国式探索”^[5]。

这种革命理论对于俄国现实的适应,还在于作为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契合”。这种“契合”,首先表现为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特质、以客观科学性为基本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罗斯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同一性。

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将俄罗斯“拖向西方”,迫使它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同时,也推开了俄罗斯吸收欧洲文化的大门。于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产生了杰

出的科学巨匠罗蒙诺索夫,并在他的主持下于1755年创立莫斯科大学,当他第一次通过实验证明物质守恒定律,而为唯物主义的物质不灭提供自然科学证明,当他抛弃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唯心成分,赋予原子为“物理单子”并具有能动性时,罗蒙诺索夫就在成为俄罗斯先进自然科学奠基人的同时,奠定了俄罗斯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秉承罗蒙诺索夫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拉吉舍夫,则在力求证明精神、道德对物质、经济的依赖性^①,强调“生命、感觉和思维都是同一个物质的作用”^[14],论证“灵魂不死”只是“想象、梦幻、幻想”^[14]等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充当了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由近代机械唯物主义阶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中介。

作为近代西方“四大革命”^②及其后果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实践是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的理论,在为长期以来处于乌托邦幻境又急于改变社会现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提供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科学依据时,也适合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改变现实的行动需要,使他们找到了行动的根据。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创立途径是物质生产的实践,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立足之基,却是不争的事实^③。于是,关注人的需要、欲望、现实存在、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在适应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改变落后现状心理需要的同时,也与由罗蒙诺索夫和拉吉舍夫为代表而奠定的近代俄罗斯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有了“对接”的可能。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富有辩证性、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民众改变现实的热望和理想之间所具有的一致性。这

① 对此,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论人、人的死与不死》等著作中皆有论述。

② 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德国哲学革命,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自然科学革命。

③ 正是因为近代以来直观的唯物主义,在高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人权、人道主义中,将理论关注之目聚焦于“现实的人”时,才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提供了阵地。对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334页)

一点,我们同样能在近代俄罗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中找到端倪。

尽管长于唯物主义而短于辩证法^①是俄罗斯民族哲学的显著特点^②。但是,这不等于俄罗斯哲学中毫无辩证法思想。事实上,俄罗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拉吉舍夫的朴素唯物论,就不仅通过诸如“我们看到世界存在着,并且一切都在运动着,我们有理由无可争辩地断言,在世界上存在着运动,而且运动就是物质的属性”^[14]的观点,肯定了物质运动的客观性,而且通过论证自然界物质的“千变万化”,以及变化与规律之间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14],涉及到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在面对俄罗斯社会复杂的矛盾时,“适应”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多个角度、多种需要去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对于“摧毁”、改变现实世界重要性的强调^[15],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参与性的强调,关于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强调等等理论,则“契合”了社会转折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民众因渴望变革而躁动的社会心理。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以批判资本主义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 19 世纪中期前后那些抱有俄国“特殊论”、期待并尝试着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灾难而直接在俄国农村村社基础上实现“村社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理。

尽管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寻求理论武器中曾一度沉浸于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当赫尔岑等曾经的西方主义者在亲眼目睹了 19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种种严酷而又无法自行解决的社会问题时,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西欧民众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而自己谋求解放之路时,苦闷彷徨的他们在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祖国,转向俄罗斯的村社、俄罗斯农民时,也对运用辩证法分析资产阶级、严厉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亲近感。

而以与生俱来的批判本性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产物,而且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揭露和严厉谴责因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道德伦理的极度恶化以及各种

类型的新剥削、新压迫,并通过这种批判提醒一切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们不断反思这个似乎是“永恒天国”的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苦难感受深刻并无情揭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适合”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探寻“走自己的路”现实需要的同时,也通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6]而走向新的更高社会形态的设想,适应了他们构建“村社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需要^③。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兼具客观物质性与人的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阶层^④普遍具有的“向往加厌弃”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

与俄罗斯社会发展虽已进入资本主义,又仍然保留若干传统社会的结构要素、文化习俗、观念意识乃至社会心态相应的,是几乎俄罗斯“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5]。因此,19 世纪后期的俄国知识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着既“本能”地抵制、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又“希望获得资本主义的秩序、自由、丰裕的物质生活”的心理纠结。两种愿望“奇怪地交织”^[5],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反资本主义的思维中接近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而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的理论,以及关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双重历史作用的评价等等理论,则适应了俄罗斯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对于资本主义的

① 王东认为:“擅长哲学唯物主义,而缺失辩证法,不仅比较普遍地表现在一般普通俄国人群中,而且集中表现在近代三代先进理论家、哲学家代表身上:19 世纪中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9 世纪后期的普列汉诺夫——20 世纪前期的布哈林。列宁对这 3 位杰出思想家的评论,基调大体是一致的,都是高度评价其哲学唯物主义,而同时指出其辩证法不足的历史局限。”(王东《马克思主义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7 页)

② 诸多学者也对此有过论证,并似已成为学界共识。

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和“跨越论”与“村社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其历史视野上,是基于“世界历史”;在其历史方法上,是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而这却是“村社社会主义”所不具备的。

④ 包括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地方自治局人员和科技人员、非国家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脑力工作者,他们政治思想派别、生活经历都有不同。

“畏惧并渴望着”的矛盾心态。其中,关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双重作用的评价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具有产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即“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经济上,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极大发展了生产力;它在政治上,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人”的解放、发挥个人的潜力创造了条件,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它在思想文化上,打破了盲从、等级、特权等观念,代之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等观念^[18],指出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9]。第二,它的存在、发展具有历史局限性、历史暂时性。它无法克服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造成了新的道德退步,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是前所未有的剥削制度,“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9];它在激起“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激起“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19],“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20]。

这种“契合”,还在于随着19世纪末以来时代潮流从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向垄断的资本全球化转变,时代主题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常态向战争革命的现代化动荡转变,以“世界文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急于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现实,赶上世界现代化步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

尽管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在回望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试图在农村村社、农民“天然”的共产主义要素基础上走向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然而当普列汉诺夫等曾经抱有民粹主义观点、列宁等抱有“颠倒”俄罗斯乾坤的宏大志向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亲历了19世纪末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尤其是,当他们通过认真考察俄国社会和大量分析经济调查、统计资料后,看到了俄国农村公社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非如民粹派主张的不过是“人为措施”,

俄国已经被卷入资本的国际市场中^[21],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不可能逃逸于“世界历史”之外,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承担起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22]时,他们便从基于资本主义的“两个普遍性”^①而阐发“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了工人阶级寻求革命解放的武器。

而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指向的强烈实践品格、厚重人文精神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视域而言不再限于欧洲一隅而是整个世界,并且在分析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世界历史中洞见到这一切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与乡村、工业民族与农业民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也主张了消灭资本的阶级剥削与压迫、资本的国际剥削与压迫是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唯一途径;强调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更在于行动,不仅是“批判性解释”更在于“批判性治疗”,而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必然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制约,因此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理论,则适应了他们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靠自己的力量抓住机遇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

三、亲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契合”,除了前者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性适应了俄罗斯思想家对先进理论的渴望心理,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这种努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书信、交谈等方式在解答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等问题时,通过评述、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俄国政治活动家传播自己的理论。这种传播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创立期,到成熟期,再到他们生命的晚年,几乎从未间断。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便在1846年12月致巴·瓦·安年柯夫的长信中,以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唯心史观、庸俗

①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扩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

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主线,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在致路·库格曼、尼·费·丹尼尔逊、格·亚·洛帕廷等人的信中,积极促成自己的主要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在俄国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在 1881 年写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及其复信中,就以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共时性与差异性、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适用性等问题为中心,阐释了东方社会结构、未来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性等唯物史观的东方社会理论。

这种努力,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体力行,对俄国工人运动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例如,马克思就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请求,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俄国代表^[23]。

90 多年过去之后,当代俄罗斯哲人在回顾俄国人当初何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更多地从心理认知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对此,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米罗洛夫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境遇存在着一些十分矛盾的现象:就马克思而言,他既对俄国文化有很好的了解,与大量俄国文化代表通信,看好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全世界命运的意义,但又不喜欢俄国人。就俄国人而言,他们十分喜欢马克思,但并非喜欢他的理论,认为理论主要不是理性所建构的思想模式,而是一种足以立即解救病痛的系统方案,是一种救世主意识。因而,他们对社会理论往往带有盲目崇拜的心理。这种“矛盾”使得俄国人在对待马克思思想时也充满矛盾。形式上,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被官方列入了“黑名单”而遭到封杀;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鼓励,不论是著作出版^①还是理论传播^②皆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局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会被俄国人接受^③。由此,米罗洛夫得出结论: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喜欢俄国人,俄国人却是真的喜欢马克思;革命之前,佩戴着机关枪子弹带的水手和士兵们带着他的肖像去从事世界革命,革命之后他在很长时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24]。

这样,以唯物主义大众化为特质的俄国文化传统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强烈而迫切地渴望改造社

会,需要寻求西方激进的理论工具^④,而以客观科学性为特征的、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改造现实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借助资本的全球扩张得以进入俄国。两者相逢之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子,最终在俄罗斯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四、结语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近邻,历史上的两国无论是国情还是民情都有诸多相似性。如同近代俄国社会在面临各种生存危机又历经挫折后才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一样,近代以来的中国同样是在国家、民族面临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等在旧体制内尝试改良或黯然收场或头破血流时,才终于悟出只有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寿终正寝,却仍然没能解决困扰这个民族、国家如何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问题时;当革命以后各种救国方案层出不穷,各种思潮、主义风起云涌,却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答困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生存困境的原因,从而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内希图运用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多么不切实际。希图仿效类似欧美、日本的方式,促使国家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已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堵死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为她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指明了迷津。尽管此后的中国革命仍然历经艰辛,但是革命最后取得成功。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批判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过程中,通过分析社会结构,梳理社会基本矛盾,考察农村和农民

①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例如,早在 1884 年,俄国就已经出版了《哲学的贫困》,1873 年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关于这一出版著作的广告还刊登在政府的报纸上。

② 马克思的学说甚至在沙皇家里向各界代表讲授。当时的财经大臣维特,在对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维奇公爵讲授经济学时,就讲到马克思。

③ 更极端的是当局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某种反对革命民粹派的抗毒剂。因为在当时,革命民粹派被当局看作是现存制度的主要危险。

④ 弗兰克在 1900 年谈到,我们信仰拉萨尔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信仰卢梭和德·梅斯特尔、霍尔巴赫和黑格尔、伯克和边沁的精神财富和思想体系,我们是在汲取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哲学的残羹剩饭。(参见米罗洛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问题,深入思考诸如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如何认识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决议,如何认识各种“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创造性等等问题,从而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25]的结论,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实践引领,仍然与当年俄国革命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相似性。

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各自踏上了改革和转型之路,随之而来的社会思潮、价值取向、观念形态的多元状况,在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俄罗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早已成为现实。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一个为全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意义,更不能因此否认它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仅从苏联剧变后俄罗斯社会一度陷于混乱,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俄罗斯思想”^[26]中对爱国主义及其他对俄罗斯社会发展作用的反复重申便可证明。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国家意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其理论引领。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更加表明“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27],对于我们正视历史以便看清未来,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发展需要稳定”和“理论发展需要多样”的关系,对于我们如何基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都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探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 95 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何以在纷至沓来、林林总总的主义、学说、理论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引领,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 俄国通史简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李宏图,沐涛,王春来,等. 工业文明的兴盛——16 ~

19 世纪的世界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安启念. 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M]. 吴琼,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 米罗洛夫. 俄国社会史[M]. 张广翔,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6] 金雁.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7]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M]. 孙静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 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 1846 年[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7-591.

[10] 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二稿:1881 年 2 ~ 3 月[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2 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0-474.

[11] 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 年 10 月底[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22-356.

[12] 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2 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158.

[14] 拉吉舍夫. 论人、人的死与不死[C]//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 ~ 十九世纪俄国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7-122.

[15]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8.

[16] 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初稿[C]//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中共中

-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0-582.
- [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594.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7.
- [19] 马克思.资本论[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21.
- [20] 恩格斯.反杜林论[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98.
- [21]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C]//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62.
- [22]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刘若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
- [23] 马克思,恩格斯,托尔斯泰,等.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C].马逸若,许贤绪,陈光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4] 郑镇.马克思的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莫斯科大学副校长米罗洛夫访谈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4):65-68.
- [25]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C]//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19.
- [26]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C]//何亮亮.俄国新总统普京传——从克格勃到叶利钦的接班人.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219-242.
- [2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Sel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ZHENG Yi-sh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Russian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agerness of Russian society to innovation theory, the adap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efforts made by Marx and Eng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ssia selected Marxist philosophy in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stimulus of social realities such as Tsar autocracy hard to escape from historical disaster, various innovation incapable to stop regression, western Europe and Russian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ineffective in Russia, civilian intellectuals' cognition of inevitable revolution, and so on. Marxist philosophy can strike roots in Russia because of many factors. For example, its theory of revolution can adapt to Russian social environment, its materialism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materialism in 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dialectics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meets Russian intellectuals' expectation of changing reality, it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conforms to some intellectuals' opinions about Russia particularism, its vision of world history caters for Russian intellectuals' desire of pursuing modernization. Moreover, Marx and Engels made great efforts for that.

Key words: Russian society; Marxist philosophy; Marx; Engels; theory of change; popularization of Materialism